

1959年：郭小川的转折之年

郭晓惠

1959年郭小川满40周岁，这本是他的“不惑”之年，却成了最令他迷惑不解的一年，成了他的命运转折之年。此前，他的工作职位和个人创作都呈逐步发展、稳步上升的态势，该年年底，一次严厉的整肃使他对中国作协、甚至文艺界彻底灰心，决心远离，更使这位诗人的创作道路从此转向。

在郭小川留下的几十个日记本中，数1956到1959年的四个硬皮插图本最为精美整齐，里面几乎一天不落地写满了每一页，而且年初有“开篇”，订出一年的工作和写作计划；年底有总结，总计一年来诗写了多少行，文章写了多少万字；甚至月月都有小结，列出该月的大事和创作上的收获。这是他最认真、最有计划度过的几年时光。

几乎一日不落的日记在1959年10月27日这一天戛然而止，这之后的每一页都是空白。（直至一年以后他才重新打开日记本，可1960年全年他只记了两页，以后的十几年也顶多写一些断续而简短的流水账。）

多少年过去了，妻子杜惠仍然记得郭小川那天晚上回家以后，躺到床上目瞪天花板一言不发的僵硬姿态：

“他一回家就倒在床上，一副颓丧的样子。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不说话，我也不好问。从延安反自由主义以来，我们在家养成习惯，互相不交谈工

作单位的情况。后来我去光明日报社，才听办公室一个同志问我，你知道郭小川正在受批评吗？我就从报社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说，‘听说你在受批评呵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那天情绪不好了。你一定要冷静地对待。受批评总是有好处的，能提高我们的思想。’他听了半天，只简短地说：好的。”^①

这时的郭小川，任职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，日常工作紧张，会议和运动接连不断。在诗歌写作方面，他正处在一生的创作高峰，诗情勃发，成果丰硕。这一年，他写了《将军三部曲》等5部长篇叙事诗、《雪兆丰年》、《望星空》等7首抒情诗，出版了两本诗集。新中国的十周岁生日那天《光明日报》刊登了他的散文《生活的甜味》，次日《北京日报》又发表了他的诗作《天安门广场》。仅从9月中到11月，他就有4篇诗作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、《诗刊》或《人民文学》上。

10月，反右倾运动即以反右倾、鼓干劲，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。根红苗正、自认为革命立场坚定、接连写了十篇反右倾短文的郭小川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次的斗争对象包括自己。中国作协协会有12人受到批判，郭小川和赵树理、黄秋耘、张克、陶萍是“重点帮助对象”，王谷林、王鸿模、高炳伍、冯振山、楼适夷、杨

子敏、江航是“重点批判对象”^②。这些“右倾分子”的大多数都和农村问题有关,就是对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农村形势有所议论或反映,而郭小川是例外,他曾屡次要求下基层却未得准许,所以对农村情况不知情。

据作协党组给中宣部的汇报,他的错误主要有四条,概括如下:

1. 对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,和党闹对立,抗拒党组负责同志的批评;2. 反右斗争中右倾妥协,处理李又然问题和写丁、陈结论中有向反党分子妥协和投降的倾向,日常工作中忽略以至放弃政治领导并有右倾表现,对某些有严重错误思想者甚至反党分子姑息和迁就;3. 不安心工作,多次提出并私自活动调走;4. 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名位观念,精力放在经营个人事业上,在反右最紧张时迷恋写诗,叫嚷创作与工作的矛盾,叫嚷不能“合法地”创作,实际上是个人与党的矛盾,并写出有严重错误的作品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,突出地表现在《一个和八个》与《望星空》两首诗里,作品中还有人性论、虚无主义情绪、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、自我扩张、自我欣赏、过分美化自己等问题。另外还有想办同人刊物、“传达中央报告时有时妄加评论甚至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”等等。^③

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指下面这些问题。

他在1957年春受命为丁玲和陈企霞写结论,是作为周扬、刘白羽等倚重的骨干,却“由于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作怪”,不会“冲开罗网”、“透过表面现象去看问题的实质”,而“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态度”^④。尽管苦不堪言地写了三个多月,还是陷在“丁、陈反党集团”案的一波三折之中,落了个“妥协和投降”的罪名。

反右斗争中,他身为作协五人“整风领导小组”成员,却对“右派分子”心存同情与

姑息,跟不上党中央的步伐。晚年时他回忆起历次运动,仍然想不通鸣放如何在突然间变成了反右,他唯一一次对毛主席表现出来的不敬和怀疑,就是对我说:“我们跟不上呵,大鸣大放,突然之间……”他不说下去了,只是把朝上的手掌心猛地向下一翻(这是1976年在河南林县)。文革中他有一段检讨颇值得玩味,反映出他挖空思想理解反右却还是理解不了的苦衷:

“在反右派斗争之前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,作为一个单位的负责干部可以有三种表现:甲.正确地、坚决地放,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,正确判断和处理不同的情况:谁是真正帮助党整风,谁是恶意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;乙.煽动右派向党进攻,并且自己也散布右派言论(煽风点火与‘放’不同);丙.不许‘放’或不创造‘放’的条件;我不是上述情况,而是第四种。丁.支持‘放’,也不是煽风点火,也没有正确判断不同的情况,只想着让人家帮助党整风,甚至不分敌我,根本没有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觉悟,并且有保护自己的思想杂念,在有些人向党无理取闹时,不能坚持原则,拉私人关系。”^⑤

至于他“不安心工作”,并不是因为怕工作艰苦,他在诗中说自己愿意“像作战般地工作”,他怕的是繁杂的事务和文山会海产生不了积极的成果,比如在日记中他说:在中宣部召集的某次讨论民族传统问题的会议上,“发言者均慷慨激昂,但听不到什么真正有分析的创见”,而且“空洞和简单化”(56—8—7);在一次作协党支部会议上谈到要拟一个改革方案,但“我对于作协的工作,越来越感到悲观了。根本问题是没有做事。一切所谓方案都是空谈。”(12—5)他不由得自问:“光在作协这样把日子开会开掉吗?”(8—1)1956年夏他还写了一篇短文《写于会议夹缝中》^⑥,专门批评“为精简会议而召开的会议已不算少了。批评会议过多和过

长的文章也占用了报刊相当的篇幅。而会议还似乎没有精简……”此外,他感到作协的“一切气氛是不正常的”(7—31),“团结问题更值得忧虑”(12—5)。在这几次政治运动中,他既有充当左派骨干、整人者的一面,又有忧虑团结问题、反感斗争整人的一面,常常“心情在极度矛盾中”(7—31),日子很不好过。另外一个“不安心”的重要原因,就是他对写作的强烈兴趣,他认为自己写诗也是革命工作,而且能做出更大的贡献,他还认为秘书长好找而作家难得,应当珍惜作家。这个想法,也从周恩来总理那儿得到了鼓励。^⑦

刘白羽晚年告诉我:“我跟他(郭)那时候都想离开作协”,因为“纠纷太多”、“琐碎、烦恼”,还有“反右,造成人的关系不大好”。他说:

“他不安心工作我知道,我也不安心工作,但是我没有暴露出来,我一直等到反右以后作协开全国理事会,就是说这些问题都处理了,周扬做了报告‘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’以后,我才提出来。后来就同意我到黑龙江去了,实际我就不想回来了,想在那里落户了。哪里晓得几个月之后,中央(不是周扬)的电报经过省委要我回来参加两个代表大会,特别是八大,这样我也没办法,又回来了,扣住不让我走了。结果我也没走成,没有摆脱掉。……他想走,我也想走,我俩互相谈过。……可周扬不同意呵,邵荃麟也不同意。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走的话,就没有真正做事的人了。邵荃麟一天在家里,把人一个一个找到家里去清谈。周扬不做具体事,主要在宣传部,高高在上。做事情多的就是我们俩,所以烦得很,烦死了。……作家协会是不能去的地方。”^⑧

郭小川那几年的作品,显现出一种大胆深入雷区的自由探索精神,如《深深的山谷》写知识分子在战争的残酷和组织的约束面

前的困惑和茫然,最终跳崖自尽;《白雪的赞歌》写知识女性缠绵悱恻的爱情,并通过动摇来反衬爱情的坚贞;《望星空》写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有限;《一个和八个》更是把一个被党冤屈的犯人作为主角,写他金子一样崇高的心灵。这些作品加上其他一些都在这次批判中一并进行了清算。首当其冲的是并未发表的《一个和八个》,它被周扬拿出来批上“人妖颠倒,是非混淆”^⑨八个字发给众人作为批判目标,罪名也最大,《望星空》刚刚发表,正好赶上作为公开批判的靶子。

应该说,把郭小川推上审判台的直接动因是他和刘白羽的激烈冲突,在他们的几次交谈和往来信件中,郭小川说自己“到作协工作已将四年,最近越来越感觉难以工作下去。说句丧气话,再这样下去,有沦为‘政治上的庸人’的危险”,说自己“并不把无休止的在作协工作看作刑罚,但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会持久的,身体和精神简直似乎要崩溃了”;他还批评了作协的工作,建议党组成员轮流“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下去和读书、写作”,说这样“不仅不会影响工作,相反地,从长远看,会有助于工作的开展,也可以使这些长期做机关工作的人了解一下生活,精神开朗一下,合法地(而不是提心吊胆的)写点东西”,并说“我们不能眼看着一些同志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倒下去”。^⑩

类似的争执以及要求调走给作协领导层造成一定的压力,再加上作品等问题,正好反右倾运动一来,上面明确要求领导层中也要整肃动摇分子,郭小川就成了领导层的整肃对象。

于是,从10月下旬开始的人人过关式的党组正副书记个人思想检查,就演变成了火力集中于个别人的批判会。从11月25日至12月2日,中国作协党组连续召开7次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扩大会议,对郭

小川进行批判,参会者三十多人,除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外,还吸收了各支部书记和个别单位的有关党员干部参加。

这次突然降临的批判,对郭小川“简直是晴天霹雳”^⑪。他始而愕然,继而辩解,但终于在反复多次的批判会之后认罪服输,对自己的各项错误逐一检讨并自我批判。不过,这一过程对当事者来说艰难而又漫长,不知经历了多少“痛苦得简直不堪言状”、“绝望自卑”^⑫的日夜。

在11月中旬时,郭小川还远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他开始的检查大致集中在自己“怕斗争”、“党性不足,资产阶级性足”等问题上,说自己的“创作的健康部分也不过是爱国主义的”。^⑬

11月22日,刘白羽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,代表组织对郭的错误进行了系统而尖刻的分析,为批判定下了调子,除了“右倾”、“个人主义”、“在创作中发展到攻击党”、“对党的工作极端厌倦”、“顽强地为个人欲望而奋斗”、“内心有阴暗情绪”、到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时“收了稿费而且买了电唱机”等指责,最后说“小川属于到党里头经营本钱、股份的”。^⑭这句话听起来让人寒心,似乎郭不是自己人,而是带有个人目的混进党里的异己分子。

这几天,郭写了3万字的书面检查。11月25日的会上,他用了几个小时就自己的右倾错误、处理丁陈问题、与黎辛的关系、推荐罗烽当作家支委、个人主义、不安心工作、作品错误等逐一进行了检讨,最后给自己提了五条目标,其一为“努力学习辨别风向……主席说要斗上半个世纪;二,……个人创作,必须纳入‘国家计划的轨道’……”^⑮

11月26日众人批判开始。几天的批判会下来,郭自己记下的不完整发言记录就有两万字。^⑯高铮等指责他的检讨“叙述多,

解释多,有美化自己的一面,表白自己的一面,不够深刻,有怨气。”^⑰郭好友陈笑雨的发言先温和后严厉,他开始说小川是“积极的,努力的,有才能的,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好工作,而他确实做了不少工作”,遭到与会者“温情主义”的指责后变为“郭思想感情中有阴暗消极的东西……消极的浪漫主义,丧失信心,松懈战斗,宇宙浩瀚,人生渺小,‘空’,个人主义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反映。情绪灰暗。……《一个和八个》是为肃反翻案的文章,看不见阶级分析,全诗充满阴森恐怖的调子,灰色,毒草。悲观主义思潮的反映。”^⑱几天后进一步上纲上线:“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,唯我主义,超人哲学。”^⑲

刘白羽在11月27日又做了一个长篇发言:“小川与党的关系不正常,看发展的趋势,四年总的趋势是个人主义更发展。小川受委托联系总支,结果,作家支部在总的组织生活上松懈,两个阵地,支部和扩大会,送给了丁陈集团。小川的非组织活动,很值得注意。要调到湖北,比不做总支书记更发展了。作品、创作与工作矛盾由来久远。后来阴暗的不满,斗争艰苦时把创作越过工作,发展到个人欲望,找个人出路,最后找到资产阶级那里去。颓废、幻灭的情绪,不健康的思想感情。为什么这时突出表现出来?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在党内得到满足,欲望受到挫折。《望星空》是唯心论、十八世纪味道。最大的危害性在于削弱党性。骨子里是放弃党的领导,应态度鲜明时不鲜明。党对郭是团结、信任、期望的,从忍耐、容让、教育、帮助,多次批评与帮助没有根本解决问题,再发展到斗争。到春天个人主义起作用,爆发出来。分歧的根本点是个人服从党,还是党服从个人?问题是严重的。”^⑳

张光年的长篇批判层次清晰,分5个阶段剖析了郭的错误发展过程,并逐一分析了十几篇作品,说《一个和八个》是“反党反社

会主义的毒草”；“把反党分子美化成毫无缺点的英雄”；《致大海》中“圣洁”是“糊涂观念”，有“泛神论的东西”；《山中》“把周围同志描写得精神低下”是“反衬自己的高大”；《深深的山谷》对阶级敌人“有眷恋”，“美化了小资产阶级心灵”，并问“孤立地探索心理，主旨何在？”《发言集》中有“丧失立场的、严重右倾的”东西，“很多的温情主义”，“反映了对丁、陈的看法”；《白雪的赞歌》“脱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轨道”，“通过个人的琐事，小事化大”，是“资产阶级文艺道路”；《月下》“欣赏缺点，犯点错误，当成美好”，是“缺陷美”；《风前》“写的离情别绪”，“几乎把部队看成个人的家私”；《望星空》是“个人主义受挫折的反射”，问“自我宣传，动机是什么？”，还说“满天星斗成为人类故乡，没有常识”；甚至对基本肯定的作品也挑了一些毛病，如认为《投入火热的斗争》“过于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”，“尾巴处也有消极的东西，起来献身，当成‘给予’”，“随处流露自我欣赏、自我扩张的东西”；《向困难进军》是“以青年导师自居”；《三户贫农的决心》“对中农（退社的人）只是强调感化、等待，没有看到两条道路的斗争，思想上右，性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感情”。最后张总结说：郭“动机中很大部分是个人在创作上的野心，个人主义膨胀”，“发展到与党对抗的局面了”。^①

刘剑青分析了郭一年来在内部刊物《作家通讯》上发表的几篇短论，说“大部分都有问题”，《要积极，不要太勉强》是“严重保守思想……对意志不坚定者会起泄气作用”；《培养政治上好，又有才气的人》是“资产阶级的观点代替了又红又专”；《谈献礼》“反映小川对献礼极不严肃”；《关于题材》“忘记了大前提，绕圈回到胡风论点，什么都是重大题材”，“厌倦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，偏重身边琐事，向往小资。”^②

这两个发言集中清算了郭小川几年来

的大部分诗歌作品及有关文艺政策的短文，标准严苛，无微不至，与文革的批判高度不相上下。

后面的几次会上，众人词锋更加尖锐：“小川与同志们距离很远”，检讨“还是很不深刻”，主要问题是“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，向党斗争，严重右倾，丧失立场”^③，“根本问题是个人主义、右倾思想，与党的关系不正常。不止在思想上，还有行动。……苦痛？是由于自我发展受到了约束……实质上是个人主义与党的原则、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矛盾。因此对党不满，对党进行一些斗争，……‘独特的道路’——个人奋斗，唯我主义，第一，积极地扩大和党谈判抗衡的本钱，偷偷摸摸，要多写，成名成家，多多益善……自我中心。本钱多就闹，伸手，对抗。非组织活动向党伸手——让党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。”^④

邵荃麟也做了一个长篇发言：“反党反领导……对党的关系是根本问题”，“影响领导核心涣散，影响文学事业的发展”，“根源是个人与党的矛盾，这是一贯的。波浪式的……四年中几乎一半（时间）或不到一半不正常，甚至对立”，“中心的问题是对党赋予的政治任务以对立的态度。给白羽的信是对党组的一个抗议，和对白羽批评的反批评”，“严重的个人主义，长期以来占上风”，“创作上的修正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”；特别提出“1、经营股本的思想；2、伸手思想；3、创作上的个人表现，个人居于党之上。”^⑤

邵荃麟、杜麦青、楼适夷等还批判了郭小川想办同人刊物的企图。

随之，对郭批判的规格明显升高。在12月8日开始的、由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，陆定一、周扬、许立群、张子意、林默涵都在报告或讲话中对郭或其作品点了名。文化部副部长张子意说：“《望星空》是一种唯我主义、资产阶级极端的唯心

主义,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上发展到悲观主义、厌世主义。诗有积极的词句,是装饰和外衣,整个说来,表现作者不健康的世界观。这同个人主义发展到唯我主义有关系……”“说什么‘夜不成眠’,‘要崩溃了’,为什么精神和身体都崩溃了?……提出善意批评,这是爱护郭小川同志,绝无一棍子打死的意思。”^②在全国性会议上被点名使郭“非常震动”,觉得“无颜见许多同志”“无地自容”。

12月17日,作协党组给中宣部写了汇报,说郭的头两次检查“第一次极不深刻,第二次也仍不深刻”,“仅一般地检查了个人主义和右倾思想,避开了他和党的关系不谈”,会议初期他“对批评有抵触情绪,态度很不好”,会议后期“情绪有所改变,承认了错误,态度也比较好转”;并说“这次批判进行得比较深透细致,同志们都做了充分准备的发言”,而且“参加会议的干部认为在会议上有很大启发和教育作用。”^③

12月下旬,郭小川再次检查,这时他的调子明显提高,认识更加“深刻”,说自己想调动工作,是“想在党内谋出路”;说自己“对党不满”,“六月间给白羽同志那封信,标志着我个人主义的大爆发,公然与党对抗”;说现在明白“实际上我的理论水平很低,逻辑能力很差,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粗糙得很的……至于创作,更谈不上才能……我的那些作品,的确是乱七八糟的……实在不忍卒读”;说《一个和八个》是“我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一次反党的罪恶,无疑是隐藏在我思想深处的阴暗思想的总暴露,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,是当时修正主义思潮对我的影响的总暴露”;《向困难进军》是“自我扩张最严重的一篇,而且这些东西既不民族化,又不群众化”;说自己想“当个大作”、“理论家”的一些理想“的确是野心家的道路,如任其发展下去,的确是万分危险的”。

终于,经过多次反复的批判,到了1960

年1月,郭认识到这是一个“重新做人的问题”^④。2月底,他在一份“思想总结”中表达了自己彻底改造的决心:“1,作党的驯服工具,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和指示,叫做什么就做什么,而且鼓足干劲去做,决不说一句违反团结的话,做一点违反团结的事。2,继续检查自己的错误,同时处理和清除自己所散布的恶劣影响。……在报刊上,就创作倾向问题做全面的自我批评。已出版的应不再版,准备出版的书停止出版。……”^⑤

对于“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”的提法,郭小川过去曾经在正式的会议上表示不赞成,认为这种说法“死板”,会“限制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”,“抹杀党员的主动性、积极性、自觉性”^⑥;他还专门写过一篇短文《论“听话”》^⑦,反对“好青年=青年+‘听话’”的公式,反对“把孩子和青年限制在一个非常死板的框子里”,一超出这个框子,就说他们“不听话”、“组织纪律性不强”,文章提倡“两种根本的为人态度:一是服从真理的精神,二是创造精神”,说“对于一切事物,都要通过自己的头脑去思考,去评判;对于一切能够接触到的问题,都要有经过自己思考过的看法和意见。”可见,郭长期以来与主流意识形态确实存在一定的距离,对他的批判制止了这种不驯倾向的发展,甚至使他这个热爱写作甚于一切的人要求停止出版自己的作品!

由于全国形势的变化,反右倾运动后来突然刹车,受到批判的“右倾分子”们也没有戴上帽子,而且,中国作协党组从1961年10月到1962年为12位被批同志进行了甄别。在对郭小川的甄别意见中,党组承认郭的“个人主义等问题,在性质上是属于世界观的问题,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”,批判“在方式上有过火之处”,在提法上也有“过重或不恰当的地方”;不过,对其《一

个和八个》和《望星空》中的“错误倾向和不健康的情绪,党组同志仍然维持这个看法”。^⑧

这样,一场风暴挟着雷鸣电闪呼啸而过,似乎很快消失于无形。然而,批判给郭小川心中留下了持续终生的巨大阴影。首先,他坚定了离开作协的决心,几经努力,终于在胡乔木的帮助下调到人民日报当了一名记者,从此远离中国作协,也远离了文艺管理机关。

更重要的是,这次批判扭转了他此后的创作道路,在他的创作天地里竖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,中止了他原本热情满怀的自由探索。从此以后,他严守创作禁区,再也不碰人性、善恶、爱情、知识分子等等“不能碰的题材”^⑨,再也不写可能被人抓住辫子的作品;从此以后,他不再写“小题材”,而总是以小见大,追求宏伟;从此以后,他的调子更向“左”转,他的长篇通讯、报告文学和某些诗作,表现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分热衷。他的这些表现,既出于对理想和事业的信仰,也出于让整过自己的人看一看“究竟我是否右倾”的心理。总之,从此以后,他拿出来的几乎都是赞歌。

① 杜惠 2005 年 10 月 1 日口述。

② “中国作协 1959 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总结”,《检讨书》,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年,第 65 页。

③ 郭档案材料,详见《检讨书》第 37—43 页。

④ 郭 1959 年 11 月 25 日“我的思想检查——在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扩大会上”,《检讨书》第 12—16 页。

⑤ 郭小川家存深色硬皮笔记本第 18 页。

⑥ 《郭小川全集》(以下简称《全集》)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,卷 6,第 454 页。

⑦ 郭 1956 年 3 月 8 日日记:“十二时,一部

分同志到总理处,在紫光阁谈作家的条件问题,总理一个个地问,问到我说:‘你是不是作家?’曹禹他们说,我是写诗的。总理说:‘影响不影响你的创作?’我窘住了,完全没想到会这样问,我说:‘工作需要嘛!’总理笑了:‘党性很强呵!’随后,他又说,作家不应当做行政工作,而由别的同志来做,高兴极了。”《全集》卷 8,第 401 页。

⑧ 刘白羽 2000 年 3 月 30 日口述。

⑨ 杨子敏 2000 年 11 月 18 日口述。

⑩ 郭 1959 年 6 月 9 日致刘白羽信,《全集》卷 7,第 200 页。

⑪ 郭在检讨中说:开始一直没觉得《一个和八个》有什么问题,“到了党组同志那次谈心会上,有的同志提起,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!”《全集》卷 12,第 31 页。

⑫ 郭“第二次补充检查”,《全集》卷 12,第 37—43 页。

⑬ “思考片段”,《全集》卷 12,第 47 页。

⑭⑯ 《人有病天知否》第 207 页、第 200 页。

⑮⑯⑰ 《全集》卷 12,第 19—33 页、第 74—75 页、第 48 页、第 45—46 页。

⑱ 以下大部引自郭小川的记录,《全集》卷 12,第 49—74 页,有些经笔者稍加整理。

⑲ G 的发言(字母代替的人名根据为郭小川家存的笔记本,下同),《全集》卷 12,第 50 页。

⑳㉑ C 的发言,《全集》卷 12,第 49 页、第 67 页。

㉒㉓㉔㉕ L 的发言,《全集》卷 12,第 50—53 页;Z2 的发言,第 58—62 页;L2 的发言,第 63—64 页;H2 即何文发言,第 64 页;Y 即严文井发言,第 64—66 页;S 的发言,第 67—70 页。

㉖ 陈默、刘剑青在批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,《人有病天知否》第 204 页;又见郭小川文革检查中对徐迟所说“一定要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”的反驳,《全集》卷 12,第 104 页。

㉗ 《全集》卷 6,第 351 页。

㉘ 《检讨书》第 65—66 页。

㉙ 郭 1961 年说:“我写《一个和八个》是没有经验,不知道有些题材是根本不能动的。”《检讨书》第 185 页。